深港合作过往成功例子和启示

我谈一谈我的一些感受和经验，在2002年当驻粤办主任以来，我跟深圳有几个交往印象比较深刻。西气东送和前海自贸区的合作都不是香港主动，是深圳市政府主动要求我联系香港来推动的，从深圳的角度来讲，两个都是成功的项目。成功的原因，都是懂得看透中央的需要，以及香港的地位。从这一点我感受到，香港缺乏中央政策的敏感度，也不懂怎么可以用好这些各方面的联系，来推动整体发展。

在80年代香港回归之前，我们并不鼓励跟内地接触。90年代慢慢谈判、慢慢回归，接触还是非常敏感。1981年我参加政务官，第一个培训的项目就是在香港文锦渡英军的军营，爬上去看深圳，就只能看到横起两条街，一个小小的街道。1985年我第一次过来，深圳已经是特区，那时跟深圳方面的同事沟通的时候还要用英文发言，要翻译成普通话，深圳方面也要用普通话发言再翻译成英文。

不要说对内地，只说对深圳，虽然是一河之隔、互相对望，我们的了解有多深呢？其实我们是碰面认识不吱声、不了解。我参加过7年的粤港联席会议，每一年深圳市长到香港访问都是我陪同，我们也召开香港联席会议，所有这些过程我不是不想谈，可是在我第一次陪董先生过来深圳，那个时候是黄书记和于市长，开完会以后董先生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“百忍啊，究竟我们应该加强跟深圳的关系还是跟广东省的关系呢？”他非常坦率讲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？其实这个问题就是问题所在。这个问题十多年过去了，现在是不是还一个问题？我不知道，我放在这里。

我去年开始在深圳工作，每周差不多有四天在深圳，所以慢慢跟深圳这方面的朋友接触多了。我也参加了外办组织的一个深圳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。给我的感受非常深刻，深圳非常拼搏，走出去向国际进军，也是希望国际化。可是在这个基金会里面没有香港的成份，为什么香港这个非常好的国际联络人不参与这方面的交流工作呢？

现在，年轻这一代对我们过去看到深圳从零到现在的过程不一定了解，对香港方面的感情也不一定深刻，他们只看到奶粉事件、占中、水货，他们的印象对深港的合作是非常负面的。

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就提出这几个看法，希望我们未来在各方面专家的努力之下，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个困局。我对深港合作非常乐观，深圳是我们香港回归其中一个引路人，因为香港怎么样说都是离开母体一百多年，很多人对国家的关爱感受都不太相同，我们对内地的制度不了解。

我当驻粤办主任的时候，特区的同事都说我是“广东通”，其实我自己问我通不通，我一点都不通，因为广东是非常深奥的一本书，不容易念得懂。刚到广东的时候看到很多政策，我取笑他们“这么傻的”，可是当我了解到这里的税务制度、官员制度，我觉得如果我身在其中，我比他更傻。就是因为我不了解他们的困难我才取笑他们，这样两地之间，深圳、香港，非常近，可是我们对深圳的了解都不够。

我这样用心的人都不够，没有我这样用心的人更看不透，那这样深港两地的合作都是空谈，没有深度的了解就没办法合作。

2003年6月29号温家宝总理在香港签署CEPA的时候，说“一国两制的精粹所在，是在一个国家的共同利益下面如何发挥两制不同的好处，为国家服务。”这句话，要求我们对两制都要了解。但在当前，对内地了解的人很多，对香港了解的人很多，可是对两制了解的人真的不多。

**作者系香港特区政府驻广东经贸办事处原主任、香港佳宁娜集团行政总裁 梁百忍**